

列 宁 全 集

000
A21
052

列 宁 全 集

第 三 十 七 卷

1893—1922 年家書集

人 民 出 版 社

1959年 北京

列 宁 全 集

第三十七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24 $\frac{3}{4}$ · 插页 15 · 字数 593,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446 定价（四）2.85元



弗·伊·列宁

1897 年

1930 年版“列宁家書集”序言

本書所收的書信，主要是弗·伊·列宁写給母亲瑪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和妹妹瑪丽亚·伊里尼奇娜的^①，包括的时期是从 1894 年至 1917 年^②，即从弗·伊·进行革命活动的最初几年起，至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止。这个将近 25 年的时期是我們党出現、形成的时期；而在这光荣的 25 年当中，弗·伊·一直是这个党的領袖，他領導着党，培育着党。他整个一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度过的，他个人的一切也是同这个斗争、同为无产阶级事业所进行的工作分不开的。

虽然現在出版了“列宁全集”，发表了相当多的論述列宁主义

① 不过从内容看，这些信通常都是“为了不重复起見”写給我們全家的，至少是写給当时住在一起的一家人的。

② 这里不包括弗·伊·在流放期間的家書（見“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9 年第 2—3、4、5、6 和 8 期）和 1896 年的家書。1896 年，弗·伊·被監禁在彼得堡的拘留所（从旧历 1895 年 12 月 9 日至 1897 年 1 月 29 日），經常同母亲和姐妹們見面，同他們的私人通信很少（見安·伊·叶利札罗娃-烏里楊諾娃“弗·伊·在獄中”一文（“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4 年第 3 期）和附在該文后面的 1896 年弗·伊·的两封信）。从 1905 年 11 月至 1907 年 12 月，弗·伊·住在列宁格勒或芬兰，經常同家人見面，差不多沒給他們写过信。此外，还有許多給安娜·伊里尼奇娜和瑪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的信，特别是当瑪丽亚·伊里尼奇娜住在国外的那几个时期，这些信将另行发表。（瑪·伊·烏里楊諾娃所提到的列宁的書信已編入本卷。——編者注）

的著作（包括科学研究著作和通俗著作），但是关于列宁的鲜明的多方面的个性，至今还描写得很不够，或者说几乎完全没有描写出来。

向讀者提供的这些書信 部分地 弥补了这个缺陷。从这些信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弗·伊·的生活方式、他的习惯和爱好、他对人的态度等等。我們所以特別指出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因为这些信件远不是他在上述时期所写的全部家書。由于家庭經常迁来迁去，同时我們家里的人經常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遭到搜查和逮捕，他的許多書信有些是落到警察手里沒有退还^①，有些就丢失了。在邮寄过程中書信丢失也是常有的事，特別是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因此，往往同一个問題連續在几封信中重复提到。此外，这些信件还帶有沙皇专制时期警察迫害的烙印。不錯，当时我們凡是通信談工作（报告革命事件、党的生活等等），都是用秘密方法，用化学葯水写信（通常是写在書籍和杂志里），把信寄到外人的“清白的”通訊处去^②。但是个人的一切同革命工作联系得是这样密切，所以私人的合法信件无疑也会受到警察迫害这一因素的严重影响，使我們在写信时不得不大打折扣。弗·伊·往沃洛果达給妹妹瑪丽亚·伊里尼奇娜（当时她流放在那里）去信时就會这样写过：“在我們（特別是你和我）所处的情况下，随意写信已經很困难。”

① 例如，我們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弗·伊·的6封信的摘录，这些摘录附在莫斯科宪兵局案卷的后面，作为“物証”。我們已把这些摘录編入附录。（見本卷第530—531頁。——編者注）

② 当时在俄国保存这些信件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在国外留下副本的一部分信件保全了下来。

不仅同瑪丽亚·伊里尼奇娜写信是这样，同我們全家人写信也都是这样；因为他們同弗·伊·不仅是亲屬关系，而且观点相同，信仰相同。他們大家（包括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馬·季·叶利札罗夫在內）当时都是社会民主党人，都屬於党的革命派，他們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时刻关心党的生活，与党同甘苦，共患难。就連我們的母亲，虽然她生于1835年，到90年代末期我們家里的人遭到特別頻繁的搜查和逮捕的时候已經是60多岁的人，也十分同情我們的革命活动。

当时革命者的全部合法信件都要受到检查，所以，在談到我們所关心的問題，回信說某封秘密信件已經收到以及詢問熟人的情况等等的时候，就不得不采用各种暗語、暗号之类的东西。

讀者将会看到，在弗·伊·直接寄給母亲、姐妹或弟弟的信中几乎没有提到什么人的姓名，因为在信中如果提到別人的姓名，就会給別人招来麻煩。当然，我們是絲毫不願意給任何人带来一点点麻煩的。如果在弗·伊·的信中仍然能看到一些同志和熟人的名字甚至姓氏，那只是因为反正警察局已通过种种情况（同案流放过，同校学习过等等）知道我們和他們認識，或者因为純粹是事务来往（这时写了出版人、書商等等的姓氏）。为了避免在信中提到具有一定合法身分的熟人的姓名，所以弗·伊·要想談到他們，問候他們，总是用綽号，或者用一件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作个暗示。例如，弗·伊·把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称为“历史学家”（因为他有一些历史問題的著作）；当时弗·伊·通过安·伊·和瑪·伊·同他常有信件来往^①。

^① 可惜这些通信保存下来的只有1909年12月16日的一封信。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卷第113—119頁。（列宁同伊·伊·斯克沃尔佐

弗·伊·在問候和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同時流放在沃洛果達的瓦·瓦·沃羅夫斯基時寫道：“向波蘭朋友們問好，並希望他們竭力給以幫助。”“中國旅行家”是指阿·巴·斯克略連柯，他當時在滿洲的鐵路上工作；“去年和我們一道划船的先生”，是指維·亞·列維茨基；等等。

在提到郵寄的秘密報刊、秘密通訊稿和寫有化學葯水信件的書籍時，也要用隱喻。

1900年12月底，本文作者曾托出國的格·勃·克拉辛把“社會革命黨宣言”轉寄弗·伊·。為了不被發現起見，就把宣言夾在一個照片簿里。這個郵件使弗·伊·非常高興，他在1901年1月16日的信中寫道：“多謝……給我寄書，尤其是托表兄從維也納轉寄來非常美麗和有趣的照片簿；我希望能經常收到這樣的禮物。”

“火星報”及其他秘密出版物寄往俄國的時候，有時是裝在寫着“清白的”、合法的通訊處的封套里。我們還利用這些通訊處作為自己接收書刊的地方。所以，在合法的信件里有時就通知某個郵件已經寄出，以便我們能及時向收件人查問。下面這一段弗·伊·的話（1900年12月14日的信）顯然就包含着這樣的意思：“記得在9日給你寄去了一個你喜欢的小玩意兒。”娜·康·在1916年2月8日的信中寫道：“沃洛佳收到你那封長信非常高興。希望以後多少再寫一些。”我們的合法信件從來都寫的不長，而且這封信是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寫的，當時我們通信主要用明信片，而且是掛號的明信片（因為許多信都寄丟了），所以上面這一段話顯然

夫-斯切潘諾夫的通信保存下来的有两封信——1909年12月2日一封，12月16日一封。見“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34卷第357—359頁和“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卷第113—119頁。——編者注）

是指写在書里寄去的秘密信。

1900 年弗·伊·侨居国外之初，还不知道是否能在国外站得住，当时他为了保密起見，就沒有把他本人的通信地址告訴我們；所以当他住在瑞士或慕尼黑的时候，我們給他写信都寄到巴黎或布拉格。例如，他在 1901 年 3 月 2 日的信中写来一个新地址的时候附带說：“我已随房东迁居。”弗兰茨·莫德拉切克（我們的信都寄給他）当时的确是搬到別的地方去了，但是弗·伊·却繼續住在慕尼黑的老地方。

弗·伊·性格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办事非常認真，一絲不苟，一切开支用度尤其自己的用度极为节俭。看来这些品質是从母亲那里繼承下来的；弗·伊·的性格在許多方面都象母亲。而我們的母亲按母系說是德国人，这些性格特点在她身上是很突出的。

从 1895 年 10 月 5 日弗·伊·的一封来信^①中，可以看出他用錢是多么节省，在自己的用度上是多么节俭。

“現在，我在圣彼得堡已开始記流水賬，看看自己实际上要花多少錢。結果，在 8 月 28 日到 9 月 27 日这一个月里，一共花了 54 卢布 30 戈比，其中还不包括买东西的錢（約 10 卢布）和我可能要办理的一件訴訟案的費用（也是 10 卢布左右）。当然，在这 54 卢布中，有一部分不是每个月都要花的（套鞋、衣服、書籍、賬簿等等）；但是，即使除去这部分（16 卢布），我仍然花得太多了：一个月用去了 38 卢布。显然，我过得不够节俭，例如单是乘有軌馬車一个月就花了 1 卢布 36 戈比。以后对环境漸漸习惯了，我就会少花些錢。”

① 这里說的是 1893 年 10 月 5 日的信（見本卷第 1—2 頁）。——編者注

果然他就节省起来，特别是当他自己没有收入，不得不接受“救济”（这是他对母亲给他汇去的款项的称呼）的时候。他自己俭省到这种地步，甚至当1893年住在彼得堡的时候连一份“俄罗斯新闻”^①都没有订，而是到公共图书馆去看“两星期以前的”。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找到工作以后，也许会订一份。”

弗·伊·一生都保持着这个特点。不仅是当他在俄国没有收入的时候，也不仅是当他侨居国外找不到出版人出版自己著作（例如他的“土地问题”一书就曾经整整放了10年，直到1917年才问世），有时简直陷于危急境地的时候（1916年9月他给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信^②就是一例），而且当他的物质生活完全有了保障，也就是说在1917年革命以后，他的这个特点也表现得非常鲜明。

不过，有一个方面弗·伊·很难节约，那就是在书籍方面。他为了熟悉国内外种种政治、经济和其他情况，需要阅读大量书籍，才能进行写作。

他在1895年8月29日从柏林寄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最使我吃惊的是，我的经济又‘困住’了：买书等等的‘魔头’这样大，鬼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他也尽力减少开支，主要的办法就是到图书馆去工作，而且这样还可以使他在侨居国外的生活中得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工作环境，摆脱人来人往和谈起来就没有个完的环境，因为侨居国外的人大都对异乡不习惯，感到苦闷，所以都喜欢找人谈心。

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的时候，弗·伊·也常利用图书馆来工作。他在彼得堡的时候曾写信告诉母亲，说他很满意自己的新

① “俄罗斯新闻”是当时所有资产阶级报纸中最正派最吸引人的一家报纸。

②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5卷第187页。——编者注

住处，因为这地方“离中心区不远（例如，到圖書館只要走 15 分鐘）”。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他甚至利用在莫斯科逗留了不多几天的机会到魯勉采夫博物院去工作。在克拉斯諾雅尔斯克等待輪船开航前往米努辛斯克县的时候，他也曾利用尤金圖書館进行研究，虽然每天都要跑上 5 俄里左右。

在流放地是根本談不上圖書館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弗·伊·要我們設法把圖書館的書通过邮局給他寄去。我們做过几次这样的試驗，但是邮寄時間太长（来回要一个月左右），而圖書館借書是有一定期限的。

但是以后弗·伊·有时还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他在 1914 年 2 月 11 日給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信^①中写道：“关于 1905—1908 年的刑事案件統計資料汇编，請不要买了（用不着买，太貴了），从圖書館（律师公会圖書館或国家杜馬圖書館）給我借一本寄来看一个月好了。”

弗·伊·在国外时也經常利用圖書館。在柏林时，他在皇家圖書館进行了研究。在日內瓦时，他参加了一个非常心爱的“俱乐部”（《Société de lecture》^②），这个“俱乐部”有一个圖書館，要在这个圖書館里进行研究必須报名加入“俱乐部”并交一定的会費（会費当然不多）。在巴黎时，他在国立圖書館进行研究，不过他說这个圖書館的“工作搞得很糟”；在倫敦时，他在大英博物館进行研究；只有在慕尼黑时他才深以“这里沒有圖書館”为憾事。另外就是在克拉柯夫时他很少利用圖書館。他在 1914 年 4 月 22 日給

① 这封信沒有保存下来，信的摘录是我們从警察司的案卷中找到的（見本卷第 489 頁。——編者注）。

② “讀書协会”。——譯者注

瑪·伊·烏里楊諾娃的信中寫道，“這裡（在克拉柯夫。——瑪·烏·）……圖書館很糟糕，而且對讀者極不方便，即使是這樣的圖書館我也幾乎沒有機會去……”當時他要辦報（“真理報”），要同來到克拉柯夫的同志們（到克拉柯夫來的同志比到法國或瑞士去的要多得多）打種種交道，要領導國家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工作，要開黨代表會議和工作會議等等，這些工作消耗了他很多精力，使他拿不出很多時間來從事科學研究。即使在這個時候，弗·伊·也來信這樣說：“我們常常想念日內瓦，在那裡工作做得多些，又有方便的圖書館，生活不是那樣不安和雜亂。”

弗·伊·在帝國主義大戰初期在加里西亞被捕捉釋以後又到了瑞士，他來信說：“這裡的圖書館很好，在利用圖書方面我很滿意。終日辦報的時期結束以後，讀讀書是很愜意的。”後來他又和娜·康·從伯爾尼到蘇黎世，目的之一就是“在當地的圖書館進行一些研究”。因為這些圖書館，據他說，“比伯爾尼的圖書館要好得多”（但與此同時，他還同樣緊張地進行政治工作，黨的工作；不久前發表在“列寧文集”俄文版第11卷上的弗·伊·在這個時期同卡爾賓斯基和拉維奇兩同志的通信^①也明顯地反映了這個情況）。弗·伊·僑居國外時雖然在閱讀外國書報雜誌方面條件很好，可以到圖書館去借閱，但是俄國書籍卻總感到非常缺乏。他在1902年4月2日的信中寫道：“在這裡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德文書，德文書不缺。這裡所缺的就是俄文書。”他在1900年4月6日的信中又寫道：“很少看到新書。”毫無疑問，弗·伊·在國外由於手邊經常缺少所需要的書籍，他的工作是受到不小的影響的。因此他

① 這些通信的一部分已編入“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36卷。——編者注

在家書中常常要求家里的人給他寄工作所需的各種書籍（統計材料、有關土地問題、哲學問題等的書籍），以及新書、雜誌、小說等等。從這些信中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弗·伊·在某段時間內對哪一類書籍感到興趣，他運用這些書籍進行哪些研究。

在這些書籍中，他特別重視各種統計資料匯編。

弗·伊·非常重視統計，非常重視這些“確凿的事實、无可爭辯的事實”^①，這一點從他的各個著作中，從他為這些著作所寫的草稿、所做的摘錄和計算中，可以明顯地看到。他有一篇論述“民族運動的意義和作用，民族運動和國際運動的相互關係”問題的沒有完成和尚未發表的文章“統計學和社會學”（署名：普·皮留喬夫，這是弗·伊·為了便於出版這本書而用的新筆名），也足以說明這一點^②。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一段話：

“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每一個個別的情況都是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發生的。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去掌握事實，那末，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末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應該設法根據正確的和不容爭辯的事實來建立一個可靠的基礎，來和一切今天被某些國家所恣意濫用的‘一般的’或‘大致的’論斷比擬。要這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卷第279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278頁。——編者注

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而且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①

在1902年4月2日的来信中,弗·伊·要求把他过去在西伯利亚所用的书籍里面的“全部统计材料”^②都给他寄到国外去,他说他对这些材料“有些想念”……后来,为了从各个城市更经常地得到统计材料,弗·伊·甚至专门写了一封申请书^③给1909—1910年冬在莫斯科举行的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代表大会的统计学家(这个代表大会设有一个统计学家小组),提出了要求。这个申请书发出后,得到了许多省的统计学家的答复。弗·伊·在1910年1月2日的信中写道:“我又收到了一封从梁赞寄来的有关统计资料的信,这真是太好了,看来,我将会得到许多人的帮助。”

在1908年弗·伊·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时候,曾订阅切尔帕诺夫教授论述阿芬那留斯和他的学派的小册子,有关“内在哲学”的小册子,以及其他等书。关于他的这部著作

① 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卷第279—280页。——编者注

② 弗·伊·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时所用的这些统计材料是列宁研究院在1929年和弗·伊·的其他书籍一起从国外得到的。根据这些书中的摘要和批注,还可以做出许多有关伊里奇的著作的重要结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准备材料,有一部分已载入“列宁文集”1940年俄文版第33卷。——编者注)

③ 这个申请书得以发表,还得归功于把这份申请书保存在案卷里的莫斯科宪兵局。(写申请书一事见本卷第419页。——编者注)

作，他在給妹妹的信中說道：“我对馬赫主义者已經研究了很多，我認為，他們（“經驗一元論”也包括在內）种种鄙俗透頂的見解我現在都弄清楚了。”

弗·伊·在來信詢問是否收到論述現代資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書）^①的手稿时这样写道：“我認為这部經濟著作非常重要，迫切希望它能尽快地全文发表出来。”（見 1916 年 10 月 22 日的信）大家知道，他的这个願望沒有实现，虽然他曾“尽了最大力量使文章符合‘严格的限制’”（見 1916 年 7 月 2 日給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的信^②）。他的著作遭到了一系列的改动和删节，过了 10 年以后才以本来的面目出版問世。

从弗·伊·的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动手写“現代农业的資本主义制度”^③这部著作的（这部著作尚未出版）。他在 1916 年 10 月 22 日給妹妹的信中写道：“你來信說：‘出版人希望把“土地問題”印成書，而不是印成小冊子。’这大概是要我把續篇寄去（也就是說，除了已写完的美国部分，还要写业已答应的德国部分）。等我把老出版人預約的稿子写完后馬上就动手写这一篇。”这部著作的手稿現在保存在列宁研究院，沒有写完，显然是革命“妨碍了”他写完这部著作。

收入本書的这些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弗·伊·的写作的情况和条件，反映了为了发表这些著作所碰到的种种困难。我們所指的是他的合法著作。在这方面，弗·伊·在革命前的整个时期（不包括第一次革命时期和 1912—1914 年“明星报”和“真理报”

① 見“列宁全集”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2 卷第 179—297 頁。——編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第 35 卷第 179 頁。——編者注

③ 見“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6 卷第 420—441 頁。——編者注

时期,当时他还有可能为合法的报纸写作,当时党也有自己的合法的出版机关,虽然为时很短)的处境都是很坏的,这不仅由于他侨居国外,总是缺少所需要的俄国书和其他材料等等原因,书报检查制度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关。弗·伊·所写的文章常被删削和窜改(例如“非批判的批判”一文),所出的书常被没收(“土地问题”第2卷),这样的事是不胜枚举的。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和俄国隔绝,不能和出版社等等直接取得经常的联系。例如,他曾多次想为“格拉纳特百科全书”写些东西。1914年12月22日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能为百科全书写点东西就好了,但是,如果没有机会认识编辑部的秘书,就不容易办到。”当时没有人认识这些人,当他直接写信给格拉纳特编辑部时,有时甚至得不到回音,或者很迟才得到回音。他在1915年2月给妹妹的信中说:“不能再为百科全书写点东西。我曾写信问过秘书,但是没有回音。”^①他在1912年又写道:“很遗憾,我现在在这里和出版社的联系已经完全断绝。”

如果不是同志们和亲属们极力帮助弗·伊·寻找出版人,校对他的著作,这些著作就更难出版问世。但是姊妹和弟弟并不是始终都能帮助他的,特别是当他们坐牢或流放的时候。例如在1904年他曾向母亲要马尔克·季莫费也维奇的地址,说有“出版方面的事情”找他(见1904年1月20日的信)。

弗·伊·善于埋头苦干,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但是他也善于

① 当时其他出版人给弗·伊·的回信情况也都不太好。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看列宁给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第三封信(1901年11月27日),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第326页。(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6卷第68—69页。——编者注)

抓住机会休息。他的最好的休息就是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到清靜的地方去。“在这里（指芬兰的斯提尔苏甸，他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回来后由于“非常疲乏”而在那里休息。——瑪·烏·）休息得太好了，游游水，散散步，清靜安閑。清靜安閑對我來說比什么都好。”在那里休息得的确非常好，莉迪婭·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維奇对他非常照顧和关心，后来他还常常想起这个地方，他在給刚生过重伤寒的瑪麗亞·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最好现在就把你送到斯提尔苏甸去！”

弗·伊·酷爱大自然，他不管去到什么地方，在来信时总是常常描写那里的风景。他在 1895 年去瑞士途中給母亲的信中说：“这里的风景使人应接不暇。一路上我都在欣赏。过了我給你写信的那个德国車站之后，就看見連綿不断的阿尔卑斯山，湖泊一个接着一个，使我簡直离不开車窗。”他写信給瑪麗亞·亚历山大罗夫娜說：“我常散步，現在在这里散步是不坏的，在普斯可夫（以及它的近郊）看来也有不少风景优美的地方。”他从国外来信說：“最近……我常在一个非常美丽的湖上……划船，风和日丽，景色迷人……”“最近我在这里和娜嘉以及另一位朋友去薩勒夫山作了一次极为愉快的旅行。山下边日內瓦一片云雾，朦朦朧朧，而在山上（海拔約 1 200 公尺）則是灿烂的阳光、白雪、雪橇，儼然是一个俄罗斯的美丽的冬日。山下是 la mer du brouillard，——一片云雾的海洋，除了山峰之外，什么都看不見，而且只有那些很高很高的山峰才浮現出来，連小薩勒夫山（海拔 900 公尺）也整个淹沒在云雾里。”他在 1902 年 9 月 27 日的来信又說：“我和娜嘉已經游覽了近郊的許多地方，并且发现有些地方异常幽美。”在弗·伊·的来信中还有这么一段話，看来也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他說：“这里